

# 中国近代出版事业概述

曹 予 庭

从19世纪初期开始，由于西方科学文化的传入，先进印刷技术的采用，中国的印刷出版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。

其时，西洋铅活字（凸版）印刷术已传到中国南方沿海一带，但最初期的新式印刷所都掌握在外国传教士手中。1807年奉派来华的英国传教士马礼逊，与传教士英国人米怜、中国人梁发、刻工蔡高合作，于1819年排印出第一部铅印的中文书籍《新旧约圣经》。首次在中国境内印行的中文杂志《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》，内容登载有关宗教、政治、科学、商业的消息和文章，鸦片战争（1840—1842年）后，香港、宁波、上海等地都成了西方传教士活动的基地。1843年英国传教士麦都思在上海设立的墨海书馆，是早期有影响的翻译出版机构之一，除排印宗教书籍外，也排印数学、天文学、物理学等科学书籍。1844年，美国人谷玄在澳门设立了花华圣经书房，1845年迁到宁波，改名美华书馆，它拥有当时规模最大的铅字印刷厂，出版了为数甚多的数理书籍，专供中国人研习科学之用，一时居于出版界的垄断地位。1857年墨海书馆发刊的《六合丛谈》月刊，是中国最早的铅印杂志之一。自60年代以后，外人又继续办了一些新刊物，如1862年发刊于上海的《中外杂志》；1865年发刊于广州的《中外新闻七日报》；1868年发刊于上海的《中国教会新报》（1872年改为《教会新报》；1874年又改名为《万国公报》）；1872年发刊于北京

的《中西闻见录》（1876年改名为《格致汇编》）等。1875年创刊于上海的《小孩月报》，则是中国有画报的开端。据不完全统计，从1819年到1875年的50多年间，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印行了1036种书刊，几乎大都是属于宣传教义一类的祷文，一般书刊较少。但这些书刊的相继出现，对中国出版事业的兴起却起了促进的作用。

鸦片战争的失败，使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，加深了中国社会的矛盾，也刺激了中国人民。1851年爆发了历时14年的太平天国农民革命战争。1853年太平天国在南京建都后，曾设立“镌刻营”，专门刻印革命的官书，前后曾刊行过《太平诏书》、《太平军目》、《天朝田亩制度》、《太平刑律》等书，后期（1859—1862年）还出版了《资政新编》、《钦定英杰归真》、《钦定军次实录》（以上均是洪仁玕撰著）和《太平天日》。1864年，湘军首领曾国藩镇压太平军后，创办了专门生产官刻书籍的金陵书局（后改名江南官书局）。继之苏、浙、鄂、湘、赣等省亦仿效成立各地官书局共12个。这些官书局翻刻了大量“正经”、“正史”之类的经典古籍达几百种。

第二次鸦片战争（1856—1860年）的失败，促使统治阶级中一部分人也想了解西方，并且学习西方的技术。1862年，清政府中的洋务派官僚在北京成立了清末最早的洋务学堂——同文馆，培养译员，翻译西方科技书籍。该馆设有印刷机构，刊行数学、物理、化学、历史、语文等译书。1864年同文馆出版了第一部书《万国公法》（丁韪良译）。1863年，官府又在上海设立了翻译机构“广方言馆”。1868年上海江南制造局附设了翻译馆，后又将上海广方言馆移至局内，成为当时政府从事翻译西书的主要机构。截至1905年，该局共译印了兵工、船舶、机械制造、医药、史地等书达178种，成绩很为可观，对介绍西方科学技术起了一定作用。

当时，有些拥有印刷出版力量的外国资本家，见经营书报杂志有利可图，就投入资财人力，兴办出版企业以占领中国文化市场，英商美查是最突出的一个。1872年他在上海设立申报馆，采用新式印刷机，创办了中国境内近代最早的日报《申报》；1877年间编印了图文俱备的介绍世界时事风俗的不定期刊《瀛寰画报》，首倡随报附送，以招徕读者。那时，石印术（平版）刚刚传入中国，石印书籍颇受读者欢迎，1876年他又开设了规模很大的点石斋石印书局，翻印古书善本，曾石印《康熙字典》两批10万部，不数月即销售一空，获利甚丰。之后，又用石印出版《点石斋画报》，专刊新闻集锦，发行颇广。1881年他见中国人徐鸿复、徐雨之自资创办经营石印的同文书局（后以石印印制《武英殿二十四史》而享盛名）后，又转而用铅活字排印大部头书籍以示炫耀，进行竞争。最初排印的许多小说、笔记和其他书籍共140余种，称为《申报馆聚珍版丛书》，由分设的申昌书局经售。1884年，他又以图书集成铅印书局名义用特制扁体铅字重新排印了《古今图书集成》，全书分订1628册，历时4年，共印1500部；随后又排印了《二十四史》。外商在中国经营出版企业当然有他们自己的目的和打算，然而客观上却刺激和加速了中国出版业的改进和发展。

甲午战争（1894—1895年）的结局加深了中国的民族危机，也唤起了人民的觉醒。主张改良政治的维新派人士文廷式、康有为等，于1895年在北京组织强学会，宣传维新主张，继而改为强学会书局，出版《中外纪闻》（木板雕印）；又在上海设立分会，刊行《强学报》（铅印日刊），鼓吹变法，但被清政府封禁。1897年，梁启超、康广仁等在上海创办大同译书局，规定要译印各国变法之书、学堂用书以及宪法、章程、商务等书。该书局曾出版了《大彼得变法考》、《新学伪经考》、《经世文新编》、《孔子改制考》等一批有影响的书籍，为维新变法大造舆论。

戊戌变法流产，民族危机更为严重，为推翻清朝统治，拯救中华民族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孙中山等利用新闻出版阵地，积极宣传革命主张。早在1894年，孙中山、郑士良、陈少白等东渡日本时，曾组织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，大量翻印了明末清初崇尚民族气节的书，如王夫之的《黄书》，王秀楚的《扬州十日记》，黄宗羲的《原君》、《原臣》，分送海外侨胞，激励爱国热情；另一方面又译印弥勒约翰的《自由原理》、斯宾塞的《干涉论》和各国革命史等，宣传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思想。1900年以后，上海的革命团体光复会为迎合革命形势，出版了革命党人编写的宣传小册子，最有影响的有章炳麟的《尙书》（1899年）、邹容的《革命军》（1903年）、陈天华的《猛回头》和《警世钟》（1903年）等。据统计，当时这类宣传小册子共印发了130种左右，有的翻印了一二十次之多，发行量达几百万册，为传播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发挥了巨大的威力。清政府虽陆续颁布了《造妖书妖言条律》（1901年）及《大清印刷物专律》（1905年），企图压制人民，但终究挡不住历史的潮流。1905年，孙中山在东京组成中国同盟会，创办机关刊物《民报》，宣传三民主义，同时在国内各地出版了各种书报杂志，如《国粹学报》、《醒狮》、《汉帜》、《中国女报》、《河南》、《四川》等，鼓吹民族民主革命，为武昌起义进行了充分的舆论准备。民国成立后，袁世凯妄图恢复帝制，收买了一些报刊（如《亚细亚报》）为他摇旗呐喊，又颁布了《报纸条例》、《出版法》（1914年）和《著作法》（1915年）等反动法令，查禁了反对他的报刊，以此来控制新闻舆论。袁世凯垮台后，中国又陷入军阀混战局面。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，帝国主义无暇东顾，中国民族资本得到短期发展，中国现代无产阶级队伍也逐渐形成。在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影响下，中国爆发了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反帝反封建的“五四”运动。

从甲午战争到“五四”前的20年间，是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发生急骤变化的时期。作为它的标志，其一是新式印书局的相继成立，其二是各色品种书报杂志如雨后春笋般涌现。当时国内上层知识界纷纷要求改革现状，励治图强，部分有志之士为振兴本民族的出版事业，积极自办新式印书局。1897年由夏瑞芳（字粹芳）、鲍咸恩、鲍咸昌、高凤池等创办于上海的商务印书馆，就是最早以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的、规模最大、影响最广的出版企业，始设印刷所，以印刷商务簿册报表为主；随后业务扩充，聘请张元济（菊生）等为经理和编译所负责人，遂改为以出版学校教科书、古籍、各类科学、文艺、工具书、期刊等为主要项目。1900年以后陆续出版的几种杂志（《外交报》《东方杂志》《教育杂志》），对当时思想界很有影响。1903年以后，各学堂采用的教科书很多出之于商务印书馆。1915年出版大型辞书《辞源》正编。著名人士王云五、沈雁冰（茅盾）、杨贤江、陈云等都先后在该馆工作过。与商务印书馆齐名的是中华书局，中华民国元年（1912年）由陆费伯鸿、戴克敦、沈知方等创办于上海，也以出版中小学教科书为主，兼出文艺、古籍、工具书和各种科学书，前后还印行过《中华教育界》《中华学生界》《大中华》《中华童子界》《中华儿童画报》《小朋友》《少年周报》《中华少年》等八大杂志。此外还有1898年设立的广智书局，专事译介日人所著师范教育和社会科学等书，并出版梁启超著《饮冰室文集》、吴趼人著《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》等书。1900年设立的广益书局，出版科举考试策论及童蒙读物（如《三字经》《千家诗》等），后聘胡寄尘为编辑主任，出版石印的经史子集和通俗小说。1902年由俞复、廉泉、丁宝书等创办的文明书局，更以出版教科书著称，当时它与广益书局是出版教科书较多的两家；另外它刊行过大量的笔记，如《说库》、《清代笔记丛刊》等，都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。1908年由黄宾虹、邓实等创办的上海神州国

光社，专印珂罗版画集；以后由于陈铭枢、王礼锡等的加入，改为出版历史、哲学等书籍。民国以后成立的印书局，如1913年的亚东图书馆，1915年的中国科学社，1916年的大东书局等，虽然规模较小，但都是近代出版界中著名的出书企业单位。

随着政局的动荡，这段时期的出版物也呈现出活跃的局面。图书方面，除了众多的政治著作和教科书，还出了不少以反映鸦片战争后，国内外社会政治情况和揭露官场黑暗为主要内容的通俗文艺著作，其中如《官场现形记》等谴责小说更是脍炙人口。至于翻译著作，范围更为扩大，从英、法、日文译来的都有，内容大致是鼓吹变法或者提倡革命的，赫胥黎的《天演论》、孟德斯鸠的《法意》、亚当斯密的《原富》、卢骚的《民约论》等，都是震动当时思想界的名著。社会主义学说此时也已开始引入中国。翻译小说很受到重视，林纾译的《巴黎茶花女遗事》，打开了当时士大夫阶层的眼界，他一人译了各国文学名著165种，影响不小。相对来说，此时翻译国外自然科学技术的著作，比重有所减少。

期刊方面，开始时以科学技术和工商业知识为内容的较多，如《实学报》《格致新闻》《商务报》等的出版；1900年以后，期刊的数量增多，题材范围和读者对象也更广泛。有专载小说的杂志，如《新小说》《绣像小说》（1903年）。《月月小说》（1906年）、《小说林》（1907年）、《小说月报》（1910年）等；有崇尚民族意识的戏剧杂志，如《二十世纪大舞台》（1904年）等；有以宣传教育为宗旨的画报；如《启蒙画报》（1903年）、《时事画报》（1905年）、《图画新闻》（1907年）、《醒世画报》（1909年）等；有提倡女权的妇女刊物，如《女子世界》（1903年）、《女子魂》（1904年）、《神州女报》（1907年）、《女子时报》（1911年）等；有以青少年为读者对象的杂志，如《蒙学画报》（1908年）等；还有专载译文的期

刊，如《译林》（1901年）、《游学译编》（1902年）等。据统计，从1895年至1912年，中国人创办的近代期刊共有238种，其中包括中国人最早自编的科学期刊《亚泉杂志》（1900年）和寿命最长的期刊《东方杂志》（1904—1949年）。

综上所述，中国近代出版事业虽然只有数十年的发展过程，但是无论从书刊出版的政治意义来说，还是从排印形式、生产技术以及其经营管理等来说，都呈现出一种新的景象，有别于几千年的古代书籍出版；它作为新思想、新文化的宣传、传播、积累，大大促进了社会的进步。迨至“五四”运动发生，出版事业更呈现出新的发展势头。“五四”运动是中国人民反对封建主义的伟大革命运动，也是彻底的反对封建文化的新文化运动，它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，也标志着中国革命出版事业的开端，书籍出版在这个时期内发放出灿烂夺目的光彩！

作者单位：上海学林出版社（副编审）